

“语文”一词的由来与最早的“语文课本”

郭 戈

摘要：中小学“国语”“国文”改为“语文”，原意为“口头语”与“书面文”合并，“听”“说”“读”“写”并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由叶圣陶领导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酝酿和提出，于1950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正式发文作出决断。中小学课本及课程标准首先采用，官方机构发布的全国教科书选用决定和附表遥相呼应。从此以后，“语文”二字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而“国语”“国文”的概念便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提及它。

关键词：叶圣陶；语文；国语；国文；语文课本

语文学科的历史并不长，自清末癸卯学制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大概只有120年；“语文”一词也并非新中国才有，但其作为学科名称的流行也只有70多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文教育，只是语文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文选读本。作为启蒙的读物是“三百千千”，蒙学之后要学习“四书五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从日本引入新式课程和教材，才有“国文”一科，但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文言文艰深难懂，与口语脱节，不易学习，有很大的局限性，成为现代社会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最大障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唱“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提倡白

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学的叫“国语”，中学学的仍叫“国文”。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课程要改造，教材也要革新，当时主持这项工作、同时负责语文课程教材编订的叶圣陶（1894—1988）经过多方研究，提出并决定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从此以后，语文课程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教材的名字也变成了“语文课本”，规整为一个统编版本，而且至今未变。这些便是语文学科和“语文”二字演进的简单过程，也是“语文人”众所周知的常识。这里就谈谈叶圣陶改“国语”和“国文”为“语文”的一些具体情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及时向全国供应符合新中国需要的课本，无疑是学校教育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为此，1949年4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由叶圣陶任主任，领导开国教科书的编订工作，审读各个版本的教材，所定目录《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由中央宣传部于1949年7月发布。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秋季学期开学的“国文”“国语”版本、内容焕然一新，但课程名称则一如既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继续由副署长叶圣陶担任局长，并新编了初、高中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在1950年2月公布的教科用书选用表中《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小学仍

称“国语”，中学仍称“国文”。但在当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共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才第一次出现“语文课本”的字样。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出版总署编审局语文组（之前叫“国文组”）的宋云彬、朱文叔等编写，《高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周祖谟等编写。两书均由新华书店1950年8月出版（1951年后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并从1951年开始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语文科推荐的唯一通用教材（见图1）。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宣称：“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图1 最早出版的初、高中“语文课本”（1950）和小学“语文课本”（1952）

与此相一致，无论是新编的还是当时正在使用的一些“国文”“国语”教科书，大都取名或改名为“语文课本”。其中，较早的有1951年出版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毛效同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4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2月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修订版）

与王泗原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2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1952年则出版了朱文叔、刘御等编写的《小学课本语文》（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5月出版）与鲍永瑞、张星五等编写的《农民语文课本》（4册，林汉达、辛安亭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出版）（见图

2)。其中,《小学课本语文》是最早的带有“语文”字样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为新实施的小学五年一

贯制而新编的,还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语文教材大讨论,即所谓“刘吴(即刘御与吴研因)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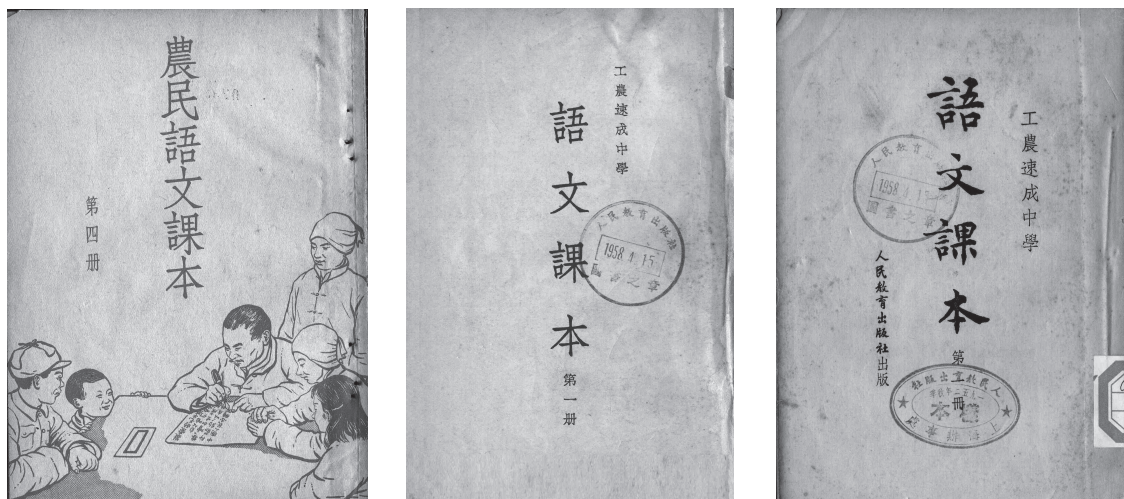


图2 最早出版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951)和农民“语文课本”(1952)

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各科教科书的供应是当务之急,所以各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工作是稍微晚于教材编写工作的。1950年8月,教育部同时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7月《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也分别提出了“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案。自此以后,中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并由课程教材带动学校教学,由教育界影响全社会,“语文”一词很快通行全国,家喻户晓。

由此可见,“国语”“国文”改为“语文”的标志和决定是在1950年的7月,最早是中小学课本及课程标准首先采用,官方机构发布的全国教科书选用决定和附表则遥相呼应。

二

以上是官方机构正式发布的情形。再看看叶圣陶本人是怎么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后,叶圣陶完成了

1949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用书的编审任务,便回过头来,开始编订指导教科书编写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既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草案”(分别由朱智贤、蒋仲仁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又做了“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分别由宋云彬、朱文叔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对于后者,《叶圣陶日记》1949年有多处记载,如:

10月6日,上午。重行审订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会谈者五人,朱文叔、宋云彬、叶蠖生、蒋仲仁及余。决以所谈结果,修改初稿,予以发表,发表之时不名“草案”,而曰“课程标准初步意见”,以征各方面之反应。

10月17日,竟日治杂事,修改余所拟之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依据前此众人公商之意见。

12月6日,上午,第一处开处务会议,余往参加。处中现分语文、史地、教育三组,各为报告。明年拟编小学中学语文课本全部。

12月8日,下午,与少数同人会谈,讨论着手编定初中语文课本之目录,及如何拟定大学国文古

典文之部之目录，以与北大清华两校同人共商。^[1]

此外，还有当时语文课本主要编写者和现在研究者的记载和结论。编审局一处处长兼语文组长、具体负责大中小语文课本编写工作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叶圣陶终审语文课本的事情，其中他在1950年3月1日写道：“语文课文修改完毕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2]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研专家刘真福在《记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课本》（2018）一文中说：“1950年版新编语文课本参与编写的人员有些是来自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有些是来自国统区的学者、编辑等。其中有个人在这套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中功劳最大，但未署名，那就是叶圣陶。”^[3]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一词的由来，明确表明了是在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过程中提出和改变的：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文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4]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中小学“国语”“国文”改为“语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叶圣陶

亲自领导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酝酿，具体于1950年7月由他研究提出，并由教育部、出版总署正式发文作出的决断。

三

叶圣陶在语文界享有盛名，被誉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一生成就非凡、贡献很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之功、开创之业。作为新中国教材机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掌门人（1949—1965），叶圣陶是当时几套中小学教材的总设计师、领导者和总把关人。对于其中的开国语文教科书和之后的中小系统编语文课本，他更是亲力亲为、带头研磨、精益求精，甚至撰写部分课文（如《开国大典》《小小的船》等）和序言（如《大学国文》等），立下了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的首功。其中，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持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的过程中，决定将流行几十年的小学“国语”、中学“国文”二科合而为一，改称“语文”二字，是其辉煌教育生涯的杰作之一，更是对语文及其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创造性贡献，不仅语文课程、教材、教学从此焕然一新，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说母语、学汉字、讲中国话的每一个人。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国文”“国语”改为“语文”的意义重大。叶至善说过：“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该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5]这样既将“国语”与“国文”合并、“语体文”与“文言文”相加、“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连接，成为新兴中国百废待举、万象更新、重建学科的一个范例，更承载了二十世纪前半

个世纪“语文人”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学”乃至“文化”相融合，及其在中小学一体化教育的探索和积累，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语文教学上，指引着我们从过去关注语文学习工具形式，转变为对工具运用的关注上，并且在确定了“语文”姓什么的基础上，进而明确“语文”应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如何学，包括编好相应的课程标准、课本、教参等。因此，探寻从“国文”到“国语”再到“语文”之路，明确语文教育发展轨迹和脉络，不失为一条回归学科本意和破解教学难题的有效路径。即便是“语文”名称的变动过程及其起因、时间、地点、人物等，也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语言文字”的缩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语文运动”即为此意，新中国初期的“新语文改革”也是如此。如若说课程教材改称“语文”完全无其影响，显然不是实事求是，但此“语文”的确非彼“语文”也。正如叶圣陶所言，实为“国语”与“国文”统一、“口头语”与“书面文”合并，“听”“说”“读”“写”并重。

综上所述还可以看出，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6]。“语文”二字的创立，很快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从而影响了几代亿万学子。与此同时，“国语”“国文”的概念就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有人提

及它。

“语文”名称使用了70多年，尤其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经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至于当下仍有“没事找事者”、不相信“语文”是语文的真名姓，谓之概念不准、释义不清、缺失民族标识等，并要求重新命名。本人之意，如同同人所言，实属“危言耸听”“玩弄诡辩”“望文生义”而已。

参考文献：

- [1] 叶圣陶. 叶圣陶日记(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138, 1140, 1148.
- [2] 宋云彬. 宋云彬文集: 第4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05.
- [3] 刘真福. 记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课本[N]. 中华读书报, 2018-09-26(14).
- [4] 叶圣陶. 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M]//刘国正. 叶圣陶教育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506.
- [5] 王尚文. 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27.
- [6] 李云龙.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J]. 中国科技术语, 2019(5): 66.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付惠云)